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国家重点图书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下卷

董辅初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明晖 张 力 崔新艳 刘殿和  
责任校对：徐领弟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下卷

董辅初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网址：[www.esp.com.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public2.east.net.cn](mailto:esp@public2.east.net.cn)

社址：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100086

出版部电话：62630591 发行部电话：62568485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三佳集团装订厂装订

787×1092 毫米 16 开 42 印张 740000 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058-1821-X/F·1293 定价：7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第一篇 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

(1976年~1984年)

<b>第一章 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折</b> .....	(3)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洋跃进” .....	(3)
第二节 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创新 .....	(10)
第三节 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	(19)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战略的转变 .....	(22)
<b>第二章 改革从农村取得突破</b> .....	(26)
第一节 农村改革的历史背景 .....	(26)
第二节 农村政策的全面调整 .....	(36)
第三节 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 .....	(45)
第四节 人民公社的终结 .....	(56)
<b>第三章 企业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b> .....	(60)
第一节 工业生产秩序的恢复与企业改革思路的形成 .....	(60)
第二节 放权让利的企业改革 .....	(64)
第三节 企业横向联合的初步尝试 .....	(71)
<b>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尝试</b> .....	(77)
第一节 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 .....	(77)
第二节 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 .....	(80)

第三节	外贸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	(95)
第四节	扩大对外经济合作 .....	(103)
<b>第五章</b>	<b>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转变 .....</b>	<b>(109)</b>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波动 .....	(109)
第二节	产业结构调整与进步 .....	(121)
第三节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139)
 <b>第二篇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阶段</b> (1984年~1992年) 		
<b>第六章</b>	<b>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b>	<b>(153)</b>
第一节	发展和改革重心的转移 .....	(153)
第二节	改革的全面推进 .....	(158)
第三节	理论的突破 .....	(164)
第四节	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 .....	(171)
<b>第七章</b>	<b>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与深化 .....</b>	<b>(175)</b>
第一节	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调整 .....	(175)
第二节	两权分离的企业改革 .....	(184)
第三节	企业兼并与破产的起步 .....	(198)
<b>第八章</b>	<b>乡村经济的发展 .....</b>	<b>(207)</b>
第一节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	(207)
第二节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城镇化 .....	(217)
第三节	农业经济的徘徊 .....	(222)
第四节	深化农村改革 .....	(228)
<b>第九章</b>	<b>进一步对外开放 .....</b>	<b>(237)</b>
第一节	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 .....	(237)
第二节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	(248)
第三节	从开放到外向 .....	(254)

---

<b>第十章 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形成</b> .....	(268)
第一节 宏观调控理论与认识的发展 .....	(268)
第二节 财税体制改革 .....	(273)
第三节 金融体制改革 .....	(278)
第四节 计划投资体制改革 .....	(283)
第五节 价格体制改革 .....	(291)
<b>第十一章 经济快速增长与治理整顿</b> .....	(296)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波动 .....	(296)
第二节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进步 .....	(319)
第三节 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	(332)
<b>第三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b>	
(1992年~1999年)	
<b>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b> .....	(347)
第一节 邓小平南方谈话 .....	(347)
第二节 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	(353)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	(363)
<b>第十三章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b> .....	(371)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 .....	(371)
第二节 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环境 with 体制背景 .....	(383)
第三节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探索 .....	(390)
<b>第十四章 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与发展</b> .....	(412)
第一节 从政策默许到政策鼓励 .....	(412)
第二节 个体、私营经济的作用、问题与发展趋势 .....	(419)
第三节 外商投资企业的迅猛发展 .....	(429)
<b>第十五章 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b> .....	(441)
第一节 我国市场体系形成的基本过程 .....	(441)
第二节 商品市场的发展 .....	(447)
第三节 金融资本市场的发育 .....	(456)

---

第四节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471)
第五节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与再就业	(478)
第六节	技术市场的发展	(486)
<b>第十六章</b>	<b>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b>	<b>(491)</b>
第一节	宏观调控体系框架的初步确立	(491)
第二节	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497)
第三节	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505)
第四节	计划投资体制的改革	(513)
<b>第十七章</b>	<b>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b>	<b>(518)</b>
第一节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确立	(518)
第二节	社会保险制度的新突破	(528)
第三节	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546)
第四节	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优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554)
<b>第十八章</b>	<b>区域经济的发展</b>	<b>(560)</b>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560)
第二节	区域经济结构变化	(566)
第三节	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	(574)
第四节	对贫困地区的扶持	(582)
<b>第十九章</b>	<b>经济发展新阶段与实施“软着陆”</b>	<b>(588)</b>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波动	(588)
第二节	产业结构调整与进步	(605)
第三节	生活水平的提高与需求不足的产生	(625)
<b>第二十章</b>	<b>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b>	<b>(638)</b>
第一节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639)
第二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659)
后记		(664)







## 第一章

# 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不仅如此，“四人帮”的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还为国民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创造了条件，需要及时从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现代化为目标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1976年~1984年这一时期的主题。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为前提，以经济秩序整顿为基础，以改革和开放为手段。由于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革是服务于发展的，因此改革在旧体制最薄弱的农村经济体制方面取得突破，工业领域也进行了局部的改革。

###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洋跃进”

“文化大革命”把思想、理论、政策和秩序完全搞乱了，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要恢复国民经济，首先是进行思想、理论和政策的拨乱反正，然后是整顿经济秩序。这是新时期的首要任务。由于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1977年和1978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和引进国外设备，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

##### （一）初步的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被置于次要和

服从地位。“四人帮”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搞得更乱，完全颠倒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大肆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和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性运动，清除了盘踞在中央、地方、部门和企业中的“四人帮”骨干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大量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使许多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各级领导岗位，同时，清理“四人帮”所造成的思想和理论混乱，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1977年3月国家召开计划会议，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工作“十个要不要”的问题，在全国展开大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不要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要不要抓好经济核算，增加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要不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要不要又红又专、为革命钻研业务和技术；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在今天看来不仅太过简单，不言自明，甚至连其中一些问题的提出都反映出受当时的环境、条件和认识的限制。但是，这次讨论初步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思想和理论问题，弄清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整顿经济秩序和恢复经济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 （二）国民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1. 各行业经济秩序的整顿。

打倒“四人帮”后，通过组织清查，把“四人帮”的帮派势力从党政组织中清理出去，使被打击和被迫害的领导干部回到领导岗位，重新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经济建设得以有领导和有秩序地进行。同时，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从1976年底到1978年，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农业、计划、工业、财贸、煤电、铁路、运输和粮食等一系列全国性的生产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1977年11月和1978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和四川省委分别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针对“文革”造成的混乱，提出急需清理落实各项农村经济政策，重点是贯彻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社员多劳多得，增产增收，使两省农村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新气象。两省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农村经济政策的清理和落实。1977年2月召开全国铁路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严重堵塞问

题，大抓铁路装车量，并解决管理混乱问题。经过整顿，日装车量从1977年3月开始回升，1978年铁路货运量达11亿吨，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水运货运量和港口吞吐量也创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的恢复和畅通，保证和促使了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4~5月间，召开了全国冶金工作会议和工业学大庆会议，强调搞好生产管理，抓企业整顿，恢复规章制度，健全领导班子，加强职工队伍团结，发展生产。1978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三十条），对企业整顿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会议及其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使工业生产的正常秩序开始恢复。同时，要求发展支农产品的生产，优先保证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燃料、电力，恢复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生产，重工业主要是抓好原材料、燃料和电力的生产。1978年4~7月召开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重新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反对闭关锁国，要求发展对外贸易，恢复和制定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管理制度，以及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物价管理等制度和办法，倡导一些企业将经营状况与职工物质利益相结合的有效做法。为了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企业普遍恢复了奖励、计件工资和企业基金制度等。

由于10年动乱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破坏很大，以及整顿经济秩序和恢复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粉碎“四人帮”后即着手对国民经济体制进行局部性的调整。主要是对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加强了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的集中统一领导。铁路运输重新由铁道部集中统一指挥，使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现象得以迅速解决；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工业企业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调整为以中央领导为主，其他企业则由地方或地方为主进行管理。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部分企业收回中央管理；对部分财政、税收、物资的管理权也收回中央。

经济秩序整顿也包括稳定市场物价。1977年7月26日，国家计委转发了商业部《关于商业、粮食系统检查和整顿市场物价中提出的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1978年1月21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当前市场物价问题的通知》。这两个文件都强调要稳定市场物价，认真检查和整顿部分消费品质量下降、变相涨价的问题；要求加强粮油价格管理，稳定蔬菜购销价格，加强对饮食、服务业以及煤炭的价格管理；规定农副产品的收购要贯彻政府的价格政策，不得任意提高或降低，坚决执行国家的牌价，坚持计划价格，反对自由价格，打击违法价格行为；要求认真安排好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等。

## 2. 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的恢复。

经过各行各业的经济秩序整顿，以及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国民经济迅速摆脱了1976年停滞下滑的趋势，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虽然1977年、1978年连续两年受灾，但仍连获丰收，总产值分别为1339亿元、145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7%、9%。工业生产也改变了停滞下降的局面而迅速回升，1977年和1978年工业总产值分别完成3728亿元和42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4.3%和13.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77年为1432.8亿元，1978年上升为1558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8%。进出口贸易额有很大增长，1978年为206.4亿元，比1977年的148亿元增长了39.5%。同时，新技术的引进和设备进口，这两年增长也比较快。财政收入1977年大幅度增长，扭转了连续3年的财政赤字。在生产初步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如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1976年为605元，1978年上升到644元。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按当年价格计算），1977年为165元（其中城镇居民为361元，农村居民为124元），1978年增长为175元（其中城镇居民为383元，农村居民为132元），比上年提高了6.1%。

## 二、“洋跃进”的出现

### （一）出现新的大跃进

粉碎和批判“四人帮”，整顿经济秩序，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得以释放和发挥，从而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使当时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形势过于乐观，轻视10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急于快速发展和赶超，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导致战线过长、比例失调和效益低下。

#### 1. 制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1977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具体目标是：第一步，第5个五年计划后3年（1978年~1980年）建成全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基本建成6个大区，极大地改变经济落后状态；第三步，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现代化，在各个生产领域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水平。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又重新提出“赶英

超美”的口号。《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已走上稳步上升、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经过修订的《十年规模纲要》还规定了各个方面的高指标。一些政府主管部门也相继制定了庞大和宏伟的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和指标大大超过了我国财力、物力和人力的限制，大大超出了我国经济和技术的承受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 2. 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和强调实现农业机械化。

新的“大跃进”是过去的延续，它包括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当时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样的伟大革命运动。要求1980年全国1/3的县要建成“大寨县”。同时，继续强调提高人民公社公有化水平，搞核算单位的升级。1977年11月，确定全国要选择10%左右的生产大队实行统一核算，为进一步过渡创造条件。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提出了“苦干3年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的口号。1977年1月，国务院又把《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转发给了各地区和各部门。该报告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等主要作业的机械化程度达到70%左右。要实现这样的机械化程度，且不说农民缺乏支付和承受能力，即使是当时的实际工业生产能力也达不到。

### 3. 盲目扩大基本建设和过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要实现新的大跃进，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1976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76.44亿元，1977年为382.37亿元，到1978年增长为500.99亿元，比上年增长31%。处在施工中的大中型项目，1978年有1723个，比1977年增加了290个。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超出了国力能够承受的程度，1978年的积累率高达36.5%。

与盲目扩大基本建设相关，过多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8年（“五五”计划后3年和“六五”计划期间）在支农、轻工市场、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等方面引进一批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中央原则批准了这一规划，并于1978年5月批准成立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通过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对长期以来强调自力更生、实行闭关政策的重大突破，因而人们把这次跃进相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称之为“洋跃进”。不可否认，一些引进项目建成以后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次大量的引进不是后来意义上的

对外开放，因为它在体制上没有任何变革。同时，引进技术和设备过急过多，缺乏客观和冷静的分析评价，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可行性研究，过高估计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以及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很少考虑本国的承受能力、消化能力、配套能力和能源供应等。在引进的项目中又大部分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和能源消耗大的钢铁、化工项目，煤炭、发电、石油等项目少，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更少，因而造成很大的浪费和加剧经济结构的矛盾。

## （二）“洋跃进”的危害

### 1. 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

“洋跃进”造成的危害主要是加剧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过去一直是重建设轻生产，重生产轻消费，新的“大跃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更导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1976年的积累率为30.9%，1977年提高到32.3%，1978年更提高到36.5%。这是我国历史上仅次于1959年和1960年两个最高积累率的第3个高积累率。1977年和1978年的积累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1.2%和30.7%，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8.9%和13.8%，积累增长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积累的使用上又轻生活性投资，而重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高达82.6%，同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建设投资所占比重1978年只有17.4%，而“一五”时期为28.3%。其次，是工农业、农轻重比例失调。由于提出和实行“洋跃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以及主要集中于发展重工业，从而使本来就已失调的工农业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衡，1976年~1978年，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由1976年的30.4%下降到1977年的28.1%，再下降到1978年的27.8%，工业则相应地由69.6%上升到71.9%和72.2%。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所占比重由1976年的44.2%下降到1977年的44%，进而下降到1978年的43.1%，而重工业则由55.8%，上升到56%，再上升到56.9%。重工业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能源工业与其他工业不协调。引进高能耗项目，更使业已存在的能源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影响许多企业的生产。1977年和1978年，全国有1/4的企业因缺能而开工不足，发电能力短缺使20%左右的工业能力发挥不出来。同时，交通运输能力也严重不足，主要铁路干线在一些薄弱区域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50%~70%。

### 2. 经济效益的低下。

“洋跃进”所造成的根本危害是成本代价大和经济效益差。经济发展高指标，盲目扩大基本建设，建设规模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等，必然导致追求速度和忽视质量，造成损失和浪费，成本代价很大，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到1978年底，全国还有1/3的企业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所以经济效益很差。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税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高水平低1/3。

### （三）“左”倾思想的根源

#### 1. 新的急于求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就出现新的大跃进，直接原因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限制估计不足，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新的“左”倾思想在1976年底召开的全国第2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已开始显露。1977年5月，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中宣称，中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并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当时不少人把这次会议称为“新的大跃进的动员会”。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并据此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超越和脱离现实的宏伟计划，要求在本世纪末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农业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要实现很高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实现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实现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实际上当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长期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有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实际困难要解决，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有待恢复和健全，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更需要改革，国家经济实力还很弱，需要逐步积累和提高。

#### 2. “左”倾思想根深蒂固

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刚刚得到恢复和发展，就产生新的急躁冒进，主要是因为长期形成的“左”倾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想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1955年夏季以后，就出现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和改变过快的情况，有冒进的思想。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思想严重泛滥起来。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是反“左”却又变成了反右。1960年冬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反右倾平反，“左”倾思想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得到初步清理，但没有彻底纠正，又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有所发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中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短暂的发展后，又开始了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止整整10年时间的极“左”思想和极“左”路线的统治。

### 3. 新旧“左”倾联姻。

“文化大革命”后的“左”倾思想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倾思想虽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但是有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新的“左”倾思想不仅一味“赶超”和制定高指标、搞“大跃进”，而且没有抛弃甚至仍然继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新旧“左”倾思想，一方面都是急于求成，对困难估计不足，对形势过于乐观，主观主义太强，理想主义很浓；另一方面都是忽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规律，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总之，新旧“左”倾思想都是受封建小生产思想的深刻影响，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思想和方法，使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小生产化”。当然，封建和小生产的思想本来是有两种可能的表现，除了表现为“左”的思想外，也会表现为右的思想，例如对于外国资金和技术等，既会表现出“排外”，又会表现出“媚外”。但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封建小生产的思想就主要表现为“左”倾思想。可见，“左”倾思想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的。另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它除了把“左”的思想推到极端之外，主要在于它的目的是篡党夺权。

## 第二节 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创新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要走上正轨，就必须进行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长期的“左”倾思想和路线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着人们的行为，如不纠正，就会使国民经济自觉和不自觉地沿着原来的轨道继续滑行下去。要使国民经济转轨，就必须解放思想。由此，及时地发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 一、解放思想，研究和解决新问题

### （一）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是纠正被歪曲了的思想路线、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前提。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思想路线走偏的根源和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根据，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包含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解放思想是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先导。只有思想解放了，脑筋才能开动，才能客观地全面地看待和认识事物，才能揭示和发现事物的规律，才能看得广和看得远，才能从走向未来和实现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过去，才能正确、迅速和有效地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团结一致向前走。同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发现、研究和认识新问题，才能为解决新问题提供有用的思想和方法，才能认识到必须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有可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确定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但是，当时还有许多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国民经济的转轨和发展就很困难。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的真谛是实事求是。客观事物是丰富和复杂的，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事物，使思想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同时，解放思想还必须使思想真正到位，正确地认识事物和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相应地，解放思想是为了培养和造就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这样的人愈多，对事业就愈有利。邓小平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他号召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根基

要使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实行转轨，实现时代性的转变，所需要的不是